

# 全球经济“双循环”与“新南南合作”\*

王跃生 马相东

世界经济结构的固有矛盾是经济与金融危机频发的根源。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正从传统的“中心—外围结构”走向“双循环结构”，即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循环和以中国等新兴大国为中心的新循环并存的结构。双循环结构的形成有利于世界经济平衡与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中国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为推进双循环结构的形成，应大力开展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新南南合作”，通过贸易、投资、金融、产业、区域一体化等合作形式，促进新经济循环的发展。

关键词：世界经济结构 中心—外围结构 全球经济双循环 新南南合作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正在经历深刻变化。西方经济学家常把这一变化归结为经济再平衡。然而，所谓再平衡要解决的只是贸易与金融失衡，其背后的含义可能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的政策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并非解决世界经济整体的结构失衡。而这一整体结构失衡才是世界经济诸多矛盾以及金融危机的根源。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的作用大大降低，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以此为契机，世界经济结构也从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中心—外围式的单一循环<sup>[1]</sup>，逐渐演变为一种更复杂

王跃生系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教授；马相东系北京市委党校讲师。

\* 本文是国家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合作研究课题“全球治理格局变动下的国际竞争与合作研究”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企业异质性与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研究”（批准号12CGJ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国家开发银行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研究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中肯修改意见，已根据这些意见作出了修改。文责由作者自负。

[1] 中心—外围理论最早是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提出的一种理论模式，借以描述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关系。我们认为，尽管这一概念多有争议，其内涵与本文亦不完全一致，但大致可以借用来表述传统世界经济结构的特点。

的双循环。一方面，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仍保留着传统经济循环：亚洲国家作为主要制造中心和出口中心，承接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向后者出口制成品，形成贸易与资本账户盈余，而后又以间接投资形式使资金回流美国等金融中心，通过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实现资本全球配置，由此形成一种中心—外围式的全球经济循环。在这一循环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处于主导、主动地位，并获得这种循环的大部分利益；新兴国家处于从属、被动地位，接受既有规则和分工，获取加工制造和出口红利。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等亚洲国家成为新兴工业化地区和全球制造中心，又与资源丰富但工业化程度更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合作，开发并进口资源与初级产品，输出制成品，扩展当地市场，并通过直接投资转移成熟产业，带动当地的工业化进程，由此在新兴工业化国家与亚非拉国家之间通过贸易、投资、产业转移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循环。在这一循环中，新兴国家处于主导、主动地位，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相对的从属与被动地位。

以上就是世界经济的双循环的基本态势。前一个循环是战后世界经济的基本结构，维持了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但由此导致的贸易与金融失衡使其难以为继，并最终酿成金融危机。危机以后，美国等国家强行推进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再平衡（比如中美再平衡），试图通过制造业复兴和打压来自后者的进口维持美国的增长和就业。但这种再平衡不仅不现实，也未必有利。如果发达国家为恢复贸易平衡强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新兴国家由此而陷入增长大幅降低的境地，可能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动力的丧失，引起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实际上，只有在逐步使传统循环趋向平衡的同时，着手新兴国家的结构改革，建立起新的经济循环，世界经济才有可能获得稳定的增长动力，全球再平衡也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新循环的建立，正是世界经济结构改革的关键。

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的出现，是世界经济结构和格局变化的一种自然反应。在双循环结构中，亚洲特别是中国同时深深参与两者之中，扮演着重要的双重角色。然而，双循环结构只是初露端倪，需要深入研究，充分理解双循环格局及其形成过程，采取积极的战略和对策推动这一进程。

以往对世界经济循环及中国角色的研究，偏重于对中国与发达国家经济关系即第一循环的研究，这方面研究成果丰富。对于第二循环的研究则刚刚开始，亟待加强。本文着重探讨世界经济双循环的背景、形成、内容，以及如何通过新南南合作推进双循环格局的发展。

## 世界经济既有格局及其矛盾

二战以后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总体上是以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一元格局。

战后初期，两大阵营对立，经济世界也一分为二，形成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系。随着1980年代原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和先后走向市场经济，美国和美元为中心的一元格局进一步扩展到全球，形成了以美国和主要发达国家为中心、按经济发达程度和与中心国家联系紧密程度由近及远涟漪式展开的中心—外围格局：主要发达国家居于世界经济体系核心，是技术研发、产业创新、制度规则、资源配置和全球治理中心，广大外围国家则充当资源、市场、加工制造角色。随着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中心国家逐步向外围国家淘汰不再具有价值创造能力的产业和环节，自己则始终控制着最具有价值创造能力的产业和环节。结果，主要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呈现巨大不平衡，且差距不断拉大，虽然也有少数国家可以通过这种联系获得较快发展，跻身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世界经济中心—外围格局的形成是以发达国家的巨大经济优势为基础的，通过战后初期形成的一系列有利于中心国家的制度安排和治理结构得以维系，并在1990年代全球化加速发展以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和极端化，为后来的危机埋下隐患。中心—外围结构的核心架构是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以及国际经济决策与协调机制。

以美元为核心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与之协调配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维系战后世界经济格局的主要制度基础。通过该体系，美元获得了世界货币地位，主要发达国家货币承担配角，共同构成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这一体系的建立一方面保证全球货币体系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则为美国通过美元霸权地位执行利己的货币政策以控制全球经济创造了条件。布体系瓦解后形成的牙买加体系依然保留了布体系下美元的大部分特权，美国得以继续执行以往的政策，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美元一家独大的格局实际上也是全球经济不平衡和金融危机的根源。

世界经济格局的另一个支柱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世贸组织（WTO）。虽然国际贸易体系中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特权不如在货币金融领域那么明显，但作为这一体系的创立者和主要规则制定者，必定会制定对自身有利的规

则，后来者只能接受既有规则。GATT 被 WTO 取代，贸易政策从货物贸易转向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无一不是主要发达国家意志的体现，是在发达国家将大部分制造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而自身大力发展服务业背景下的利益所系。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初级产品和资源价格，一般加工制造与品牌、设计等价值链环节的增值能力转变等，都掌握在中心国家手中，这是世界经济的现实。GATT 和 WTO 所发起的多轮谈判，从议题的提出到谈判结果，以及国际贸易政策的方向、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更迭，贸易保护主义从关税转向种种非关税措施等等，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联合国专门机构和七国集团（G7）等全球性及多边性国际经济组织与协调机制更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俱乐部和交易场所。通过这些机制，发达国家控制着全球货币政策、资本流动、国际规则，进一步强化了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除以上这些制度性的机制外，中心国家还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协定、发展援助、经济思潮、文化影响、意识形态等软性力量，更大程度上强化了自己的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将世界大多数国家纳入了既有国际经济体系。

应该承认，二战后形成的这一世界经济秩序尽管未必合理，但确实是当时全球经济实力对比的体现，也保证了世界经济在相当长时间内的稳定和发展，形成了战后世界经济顺利发展几十年的黄金时代，全球经济总量、贸易总额、国际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人均收入水平等都获得了长足发展（见表1）。

表1 全球GDP、货物出口总额、FDI流量与存量、人均国民收入  
(1960—2012年, 单位: 人均国民收入, 美元; 其他, 万亿美元)

年份	1960	1970	1980	1990	2000	2005	2007	2009	2010	2011	2012
GDP总量	1.3	2.9	11.0	22.0	32.3	45.7	55.9	58.1	63.4	70.4	71.7
货物出口	0.1	0.3	2.0	3.4	6.5	10.5	14.0	12.6	15.3	18.3	18.4
FDI流量	-	0.01	0.05	0.24	1.24	0.90	2.27	1.15	1.50	1.68	1.39
FDI存量	-	-	0.5	2.1	8.0	12.6	19.3	19.5	21.1	21.4	23.6
人均收入	467	779	2552	4095	5296	7120	8101	8688	9083	9527	10015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WDI数据库（GDP总量和人均国民收入）、WTO数据库（贸易总量）和UNCTAD数据库（FDI流量与存量）。

但是，同样必须指出，战后形成的世界经济格局尽管具有必然性，反映了当时的经济面貌，却已经很难适应21世纪变化了的世界经济状况。实际上，世界

经济结构矛盾正是在1990年代全球化加速发展以后随着这一结构不断强化和极端化而凸显出来的。如果说90年代以前中心—外围结构下的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同产业之间的分工，利益的分配主要表现为同一产业价值链不同环节利益分割的话，那么，90年代以后这种分工则更多表现为制造业与服务业、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分工，利益的分配表现为金融业暴利与制造业微利的分割，以及有关国家制造业过度外流，产业空心化，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实体经济的萎缩与虚拟经济的膨胀进一步强化了有关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和国际收支失衡，起初尚可通过间接资本流入弥补经常账户差额，通过资本市场和金融业发展吸引资本流入，到后来只能通过政府大幅举债和超发货币来维持，从而形成债台高筑和全球失衡的局面，并成为债务危机以及金融危机的基础。

可见，中心—外围格局内在的前提是中心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包括实体经济实力，占有世界经济的绝大部分份额（存量），并且充当着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角色（增量）。然而，这一基本前提，随着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崛起已经不复存在。

众所周知，新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由于产业空心化和长期过度举债、过度消费，处于持续低迷状态。金融危机更对美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欧盟经济由于成本居高不下、制造业外流、福利制度的拖累以及制度弹性缺失，增长潜力比美国更差，并最终酿成欧债危机。日本则陷于十余年不能摆脱的经济停滞。而中国等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经济发展迅速，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按美元汇率计算，金砖五国GDP占全球比重2012年已达到20.5%，接近美国的份额；而20国集团中的11个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11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2010年即达到25.2%，超过美国的份额（见表2）。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PPP）计算，金砖五国GDP占全球比重早在2006年就超过美国份额（两者分别为21.3%和21.2%）；新兴经济体11国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2009年即达到33.6%；2012年，金砖五国和新兴经济体11国GDP的全球份额分别为美国的1.5倍和2.0倍（见表3）。

如果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增量）来看，新兴国家的作用更为显著。据有关统计，新世纪以来，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达到20%以上，而2012年则达到1/3以上。而整个金砖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2010年即达到60%，今后几年将一直维持在60%。<sup>[1]</sup>在世界经济中已经占到举足轻重地位并且

[1] 林跃勤、周文主编：《金砖国家发展报告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兴国家，在旧格局中却长期处于边缘，仅仅作为既有秩序和规则的接受者，这显然是不公平、不平衡的，也很难持久。

表2 金砖五国和新兴经济体11国GDP及其全球占比  
(美元汇率, 2003—2012年, 单位: 万亿美元, %)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世界	37.59	42.29	45.73	49.54	55.88	61.34	58.08	63.41	70.37	71.67	
美国	11.09	11.80	12.56	13.31	13.96	14.22	13.90	14.42	14.99	15.68	
中国	1.64	1.93	2.26	2.71	3.49	4.52	4.99	5.93	7.32	8.23	
巴西	0.55	0.66	0.88	1.09	1.37	1.65	1.62	2.14	2.48	2.25	
印度	0.62	0.72	0.83	0.95	1.24	1.22	1.37	1.71	1.87	1.84	
俄罗斯	0.43	0.59	0.76	0.99	1.30	1.66	1.22	1.52	1.90	2.01	
南非	0.17	0.22	0.25	0.26	0.29	0.27	0.28	0.36	0.40	0.38	
阿根廷	0.13	0.15	0.18	0.21	0.26	0.33	0.31	0.37	0.45	0.47	
印度尼西亚	0.23	0.26	0.29	0.36	0.43	0.51	0.54	0.71	0.85	0.88	
韩国	0.64	0.72	0.84	0.95	1.05	0.93	0.83	1.01	1.11	1.13	
墨西哥	0.70	0.76	0.85	0.95	1.04	1.09	0.88	1.04	1.16	1.18	
沙特阿拉伯	0.21	0.25	0.32	0.36	0.38	0.48	0.38	0.45	0.58	0.72	
土耳其	0.30	0.39	0.48	0.53	0.65	0.73	0.61	0.73	0.77	0.79	
金砖 国家	合值	3.41	4.13	4.98	6.00	7.69	9.33	9.48	11.67	13.97	14.72
	份额	9.1	9.8	10.9	12.1	13.8	15.2	16.3	18.4	19.9	20.5
新兴 11国	合值	5.64	6.66	7.95	9.37	11.50	13.40	13.04	15.98	18.89	19.89
	份额	15.0	15.8	17.4	18.9	20.6	21.8	22.5	25.2	26.8	27.8
美国份额	29.5	27.9	27.5	26.9	25.0	23.2	23.9	22.7	21.3	21.9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并根据有关数据计算。

世界经济格局的矛盾还表现在国际金融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货币制度、国际经济决策机制等方面。美元一家独大充当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局面与美国不断衰落的经济实力和日益增长的巨额国际收支逆差越来越不协调, 只能靠发行货币、举借外债维持。而拥有最大国际收支盈余和外汇储备的制造业出口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没有发言权, 只能被迫将资金廉价借贷给最富有的国家, 这更违背常理。在贸易方面, 当中国等新兴国家已经成为世界最重要贸易体、大宗商品最

大买家和制成品最大卖家的时候，对相关产品价格却完全没有影响力，仅仅充当价格接受者，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也是不合理的。至于国际经济协调，主要国际经济治理机构都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占世界经济半壁江山的新兴国家基本上被排斥在国际决策之外，不可能不导致矛盾冲突。同时，一些发达经济体常常利用国际规则甚至国内法律制裁其他国家，贸易战、货币战暗流涌动，在这种背景下，很难想象会有利益一致共渡难关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

表3 金砖五国和新兴经济体11国GDP及其全球占比  
(PPP, 2003—2012年, 单位: 万亿国际元, %)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世界	49.28	53.12	57.31	62.72	67.94	71.84	72.10	76.64	81.35	85.89	
美国	11.09	11.80	12.56	13.31	13.96	14.22	13.90	14.42	14.99	15.68	
中国	4.12	4.66	5.36	6.24	7.33	8.22	9.05	10.12	11.30	12.47	
巴西	1.37	1.48	1.58	1.70	1.85	1.99	2.00	2.18	2.29	2.37	
印度	2.01	2.23	2.52	2.84	3.21	3.41	3.73	4.18	4.54	2.37	
俄罗斯	1.34	1.47	1.70	2.13	2.38	2.88	2.73	2.96	3.20	3.37	
南非	0.35	0.37	0.41	0.44	0.48	0.51	0.51	0.53	0.56	0.59	
阿根廷	0.35	0.37	0.42	0.47	0.57	0.72	0.67	0.81	0.98	1.04	
印度尼西亚	0.60	0.65	0.71	0.77	0.84	0.91	0.96	1.03	1.13	1.22	
韩国	0.97	1.04	1.10	1.17	1.27	1.31	1.31	1.41	1.48	1.54	
墨西哥	1.11	1.19	1.30	1.45	1.54	1.63	1.61	1.72	1.91	2.02	
沙特阿拉伯	0.42	0.45	0.49	0.52	0.55	0.58	0.59	0.63	0.68	0.82	
土耳其	0.59	0.69	0.78	0.89	0.98	1.07	1.04	1.15	1.26	1.36	
金砖国家	合值	9.18	10.23	11.57	13.35	15.26	17.00	18.02	19.97	21.89	23.59
	份额	18.6	19.3	20.2	21.3	22.5	23.7	25.0	26.1	26.9	27.5
新兴11国	合值	13.19	14.61	16.36	18.62	21.00	23.22	24.20	26.72	29.33	31.59
	份额	26.8	27.5	28.5	29.7	30.9	32.3	33.6	34.9	36.1	36.8
美国份额	22.5	22.2	21.9	21.2	20.6	19.8	19.3	18.8	18.4	18.3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WDI数据库, 并根据有关数据计算。

由此可见, 在世界经济版图已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传统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结构面临诸多矛盾。世界经济失衡就是矛盾的集中表现, 而次贷危机和欧

债危机则是矛盾的总爆发。实际上，世界经济的结构矛盾，旧秩序与新版图的失衡，危机以来已越来越受重视，国际社会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试图缓解失衡。然而这种变化还远远不够，并没有根本改变既有的世界经济体系。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基本未变，美欧仍然控制着两大机构的领导权，美国仍然拥有一票否决权；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治理中充当陪衬的局面仍然没有打破；议论多时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几无进展，对美元和美国金融中心的依赖依旧；全球分工格局依旧，新兴国家的结构改革和经济转型不仅得不到发达国家的支持而且受到压制，困难重重。近几年来，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任何变动，无论是实行量化宽松（QE），还是试图退出QE，都会引起全球经济的巨大恐慌，就是证明。

### 形成中的世界经济双循环格局

当前形势下，既有世界经济结构已经不适应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但改变既有结构注定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绝非易事。然而，如果中心—外围循环的结构不改变，外围国家依附于中心国家，充当加工制造基地的局面就难以改变，新兴经济体的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就难以实现；中心国家依靠这一结构获取金融利益的环境就难以改变，国际经济失衡的基础也就难以改变。

不仅如此，在世界经济不合理结构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一种新的中心—外围新格局又在形成中，发达国家试图以此继续维持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的主导权。

金融危机以后，在全球化红利分配矛盾加剧、多哈回合谈判停滞、全球化受阻的局面下，新的地区主义重新抬头，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猛，各种区域合作组织层出不穷。此时，美国及时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计划，试图以此控制与全球最主要的两大经济区域关系的主导权，进而维持对全球经济的主导权。在这种情况下，新兴国家如果不能找到自己的合作方式，势必又会成为发达国家制度框架的附庸。事实上，当今这样一个旧结构矛盾重重、新结构尚待形成的时期，恰恰是新兴国家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结构的时机。我们有可能利用已有的经济基础和条件，探索一条实现自身经济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从外围开始逐步改变世界经济既有失衡结构的途径，进而促进世界经济结构转型。经过新世纪以来十几年的发展，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经济调整，这一道路已初露端倪。这就是，通过



发展中国家之间迅速发展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形成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与原有的世界经济中心—外围循环有机结合，使世界经济走向双循环结构。

所谓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是相对于传统的中心—外围单循环结构而言的。它指的是，构成世界经济整体的各国经济，通过贸易、投资、产业分工、要素流动，以及区域一体化等经济联系形式，形成两个既密切关联又相对独立的循环圈。两者像锁链一样相扣，构成一个类似“8”字的双环。<sup>[1]</sup>

双循环之一是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中心，以中国等亚太新兴经济体为外围的循环。这一循环形成于战后，1990年代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进一步迅速发展，目前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体结构。在这一循环中，发达国家通过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输出，将大部分加工制造、生产服务等转移到新兴国家，形成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心化、产业金融化、经济虚拟化，新兴国家则向发达国家输出制成品和生产性服务，以此带动本国经济发展，并将贸易盈余和资本流入带来的外汇储备以债务和间接投资形式回流中心国家，构成其金融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并以此维持空心化的高负债经济得以运行。这一循环就是久已存在的中心—外围循环。当然，这一循环本身也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譬如近一两年出现的国际投资从外围国家回流中心国家，以及从外围国家转向更外围国家的情况，就是循环不断调整的表现。

双循环中的另一个循环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的经济循环。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贸易、投资和区域合作的加速发展，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实力和版图的变化，逐渐形成一个新的循环：中国等经济发展迅速、制造业较为发达的新兴国家，通过到资源丰富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开发并进口本国所需要的资源和初级产品，输出制成品，形成资源与制成品的贸易流；同时，将本国逐渐过剩和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原来处于世界经济体系偏远角落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譬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形成投资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转移。中国等新兴国家一方面通过资源进口、产品和资本输出与产业转移，大大改善了有关国家的贸易条件，带动当地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解决自身所面临的资源短缺、产能过剩、环境恶化、成本上升等难题。在这一循环中，中国等新兴国家处于相对主导方，亚非拉国家处于跟随方，根据经

---

[1] 我们认为，近几年出现的、以美国再工业化政策带动的高端制造业资本回流并没有改变国际分工和中心—外围循环的格局，只是国际间基于比较优势的产业再配置的表现，但基本的产业分工格局并未改变。类似的变化在过去几十年中多次出现过。

济和产业发展水平形成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国际分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世界经济的双循环结构并不是两个孤立的循环，而是紧密联结、互为条件的。使世界经济的两个循环联结起来的，或者说处于两环交接位置的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亚太新兴国家及其所扮演的双重角色。

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双循环的关节点，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前状况和在世界经济中有可能扮演的双重角色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是世界经济中心—外围循环的关键环节和失衡的当事方，接受发达国家投资，加工出口，形成了相当规模和水平的产业基础，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却不得不将大部分国际收支盈余投资于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蒙受巨大损失。另一方面，中国有必要也有可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制造业基础和对外投资能力，以及与亚非拉国家经济的互补性，建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摆脱单纯世界加工厂的地位，实现转型升级。反观发达国家，尽管它们以前是亚非拉的宗主国和主要投资方，但其日益空心化的经济结构和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巨大经济落差，使其难以建立起与这些国家的经济一体化关系。以非洲国家为例，近年来中国与非洲贸易和投资关系紧密程度及规模都超过欧美发达国家，就是证明（见表4）。

表4 中国和部分欧美国家与非洲贸易金额及份额的此消彼长  
(2003—2012年，单位：亿美元，%)

年份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中国	金额	160.1	306.0	409.8	558.5	735.0	1047.7	847.6	1282.7	1702.0	1723.0
	份额	4.3	6.2	6.6	7.4	8.3	9.1	10.5	12.3	13.7	13.1
美国	金额	645.6	950.0	1320.4	1617.1	1853.5	2225.0	1268.9	1726.1	1905.5	1604.5
	份额	17.2	19.3	21.3	21.4	21.1	19.3	15.8	16.5	15.4	12.2
意大利	金额	327.6	412.8	521.9	622.7	719.6	914.1	639.2	776.7	746.6	760.1
	份额	8.8	8.4	8.4	8.2	8.2	7.9	8.0	7.4	6.0	5.8
法国	金额	327.2	374.1	450.0	499.9	572.5	775.6	556.0	624.1	748.9	697.0
	份额	8.7	7.6	7.3	6.6	6.5	6.7	6.9	6.0	6.0	5.3
英国	金额	218.1	269.1	294.0	337.7	357.9	405.9	289.8	345.8	438.4	634.6
	份额	5.8	5.5	4.7	4.5	4.1	3.5	3.6	3.3	3.5	4.8
德国	金额	195.4	233.3	305.5	361.2	377.9	519.7	345.5	404.8	517.2	561.3
	份额	5.2	4.7	4.9	4.8	4.3	4.5	4.3	3.9	4.2	4.3

资料来源：UNCTAD数据库，并根据有关数据计算。

世界经济双循环的出现，既是全球化时代产业转移进一步深化发展、新兴大国崛起、亚非拉国家期待加速工业化和经济发展背景下的自发过程，也是旧格局矛盾重重、新结构尚待确立形势下大国博弈加剧、争取全球化红利的自觉过程。因此，这一过程既需要顺乎经济发展规律，也需要自觉地主动推进。

由于主要发达国家在科技、产业、金融、制度等方面的优势长期存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长期存在，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循环也将长期存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特别是亚太地区新兴国家的经济联系和分工合作日益紧密，也很难隔断。这种合作应当认为是一种双赢合作，并成为世界经济循环中最主要的循环圈。这一循环的特点是，发达国家主导国际分工，通过金融业、设计与高端制造、技术创新等控制产业链上游，外围国家则承担加工制造、生产服务等功能。

但是，由于世界经济结构不合理和长期发展不平衡，许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缺乏一定经济发展基础、在上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已经被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在这一中心外围循环中获得发展机会，根本未能进入循环，置身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之外。譬如，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曾被称为“被遗忘的大陆”，在全球都处于工业化和再工业化潮流之中的时候，撒哈拉以南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发达国家随着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的结束，产业空心化、经济结构软化等特点日趋显著，与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难以找到大规模合作的机会与交集。而中国等新兴大国的产业成熟已发展到相当程度。虽然自身工业化尚未完成，但新兴大国工业化过程的长期性以及自身的巨大规模和发展不平衡等特点，决定其在本国工业化并未完成的时候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实现较大规模的对外产业转移，在继续保持与中心国家的产业转移与分工循环的同时，展开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与分工合作，形成与亚非拉国家的新循环。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大国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合作迅速崛起。我们从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代表与中国作为新兴国家代表同非洲国家经贸关系的此消彼长就可以明确看到这种趋势。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2013非洲吸引力调查报告》显示：2007年以来，新兴经济体对非直接投资总体增长了20.7%，同期发达经济体对非直接投资总体增长率只有8.4%；2012年，新兴经济体对非直接投资超过发达国家，其中，中国对非投资增长28%，美国和法国则分别下降22%和39%。<sup>[1]</sup>

[1] 苑基荣：“中国投资成非洲发展催化剂”，《人民日报》，2013年5月8日。

事实上，构成世界经济新循环的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不仅限于贸易和投资，而且有着更广泛、更丰富的内容。譬如，中国对非洲国家的经济援助、金融合作、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紧密经济合作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自由贸易区、货币互换等金融合作；中国与东盟、中国与非洲、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中国与中亚、中国与金砖国家等等多边合作组织和机制的建立与发展，都属于这种合作的重要内容。通过这些广泛而紧密的经济合作，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和经济循环正在形成。这一循环的形成当然并没有改变以发达国家为核心的世界经济总体循环格局，但确实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结构的面貌。

世界经济双循环结构的形成，对于世界经济总体的平衡与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经济转型，对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都是有利的。

从世界经济总体发展来看，双循环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将有助于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解决长期存在且不断加剧的全球经济失衡。中国等新兴大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关系的发展，将大大改变过分依赖欧美市场的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衡的实现。同时，如果从中国向亚非拉国家的产业转移能够顺利推进，中国等国家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转变为亚非拉国家对欧美的出口，将进一步改善贸易失衡的局面。投资方面，通过对亚非拉国家的直接投资可以大大改善国际收支盈余过多地投资于美国而形成的金融失衡。与此同时，全球经济失衡的逐渐缓和，也将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改变过度举债、畸形消费的经济结构创造条件。

不仅如此，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循环形成一定规模，减少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市场的依赖后，当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以及开发性金融机构发展到可以部分替代世界银行与IMF作用的时候，当发展中国家可以在发达国家主导的TPP和TTIP之外建立起自己的合作机制而不必完全按照发达国家确定的规则行事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在世界经济中的话语权将大大提升，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将会减少，这会有助于促进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合理化。

从中国等新兴大国的角度看，世界经济双循环的形成，将大大有助于自身经济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以中国为例，中国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末端，靠低成本出口和制造业过度投资维持经济增长。经济转型战略提出多年，但进展不大，困难重重。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把对外经济关系仅仅理解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忽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关系所致。如今，当中国经济发展自身的矛盾已经十分严重，当中国的产业成熟度已经达到可以大规模实现产业转移的时候，将部

分成熟产业转移到工业化程度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腾出空间和资源重点发展新兴产业，无疑是转型升级的要义。至于通过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关系争取全球话语权，获取全球化利益，改善贸易结构，缓解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获取稳定的资源保障，也都是与亚非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的重要目的。

从对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看，第二循环的形成对于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推动也是极其重要的。过去若干年，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对资源的大量进口已经大大改善了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促进了资源相关产业的发展。未来，这种关系的影响将更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裕的自然禀赋为新兴国家投资和产业转移提供了重要条件，而新兴国家的适用性技术投资、由资源需求引致的投资都十分契合当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国等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道路，也必然随着经济联系与合作的发展转移到亚非拉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和经济起飞产生重要影响。

当然，双循环结构的形成并不是没有问题和争议的。譬如，通过大规模制造业发展实现工业化是一种普遍的必然趋势，还是东亚特例，就是有争议的。有研究者认为非洲许多国家未必需要和能够通过发展工业实现现代化，若此，中国对非洲制造业的大举投资和产业转移就不一定是未来发展趋势。同时，中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关系，进口资源型产品、出口制成品的贸易结构是否会抑制当地的工业发展，是否有“新殖民主义”之嫌，也都是争议的问题。不过，双循环结构存在的这些争议和弊端远远小于其带来的利益。这一点，无可怀疑。

## 世界经济双循环与“新南南合作”

我们认为，世界经济从传统的中心—外围循环走向双循环，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之一。这种双循环结构有助于世界经济总体的可持续增长、平衡发展和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于在双循环中处于核心环节的中国而言，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这一趋势，更要积极推进双循环的进程。为此，一方面必须继续开展与发达国家的南北对话与博弈，通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APEC）等框架积极开展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包括认真研究、积极参与TPP等新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进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积极推进发展中国家之间各种范围与形式的经济合作。对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南北关系，已多有论及，这里主要讨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为区别于过去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传统南南合作，我们将

未来的合作称为“新南南合作”。

新南南合作是相对于1960、70年代兴起的传统南南合作而言的。传统南南合作开创了发展中国家政治经济关系的新时代，但是，当时的南南合作本身有很多缺陷和局限，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有限。首先，传统南南合作是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处于工业化之前、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状态下的合作。南方国家经济结构都较为单一，资金、技术缺乏，这使得南南国家之间很难展开真正的深度经济合作，特别是产业链的纵向合作，而大多表现为穷兄弟之间的互通有无，经济援助。其次，南南合作的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建立政府间的经济合作联盟、贸易上的互惠互利以及经济援助。再次，由于当时的经济体制特点，南南合作都是由政府主导的官方合作，缺乏更具有活力和持久力的市场机制下的合作，缺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大规模参与的合作。最后，南南合作表现为政治经济紧密联结的合作，受政治的影响较大，甚至更多的是政治合作，合作的经济效果不佳。

相对于传统的南南合作，新南南合作虽然也是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的，但其背景、内容、形式、影响都与前者大不相同。

从合作的背景上看，21世纪初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自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中国家经济总体上获得长足发展，实力不断增强，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显著提升，前述金砖五国、新兴经济体11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就是集中表现。同时，不仅总量不断增长，发展中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巨大差异，既有高收入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也有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大国，还有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处于大规模工业化之前的亚非拉国家，以及富有但经济结构单一的能源出口国。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比较优势等都差异较大。而这种比较优势差异性要求相关国家采取不同的产业政策、结构政策，走不同的发展道路，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开展经济合作包括产业间的横向合作与产业内的纵向合作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到21世纪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走上了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市场在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中发挥基础作用，民营经济、私营企业获得较大发展，企业制度趋同，金融体系、市场体系不断成熟。这为开展南南合作创造了制度基础和企业前提。不久前，曾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教授提出了“新结构经济学”思想，试图探索一条发展中国家的新的发展道路。而他所依据的，正是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不同、结构政策不同、市场制度基础以及政府的积极作用。或可说，新南南合作正是新结构经济学思想在

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合作上的具体体现。

从合作内容上看，新南南合作也大大超越了传统南南合作，从传统的贸易加援助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贸易、金融、投资、产业合作、区域一体化等多领域广泛合作。在贸易方面，既有资源与制成品这种基于国家层面比较优势的产业间贸易，也有基于产业链分工的产业内贸易和基于跨国公司企业内分工的产品内贸易。贸易与投资一体化是一个普遍趋势。在金融方面，区域性的金融机构、开发银行、投资基金，区域间的货币互换、本币结算、某种形式的货币区等都是合作的内容。在投资与产业合作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直接投资迅猛发展，并通过投资带动产业转移、产业分工和工业化进程。这在传统南南合作中是很少见的。至于区域一体化更是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内容。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区域一体化组织层出不穷。WTO的数据显示，全球除索马里外，所有国家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区域贸易协定（RTAs）。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从2007年9月至2011年1月初，世界新实施的RTAs共有43个；其中14个是亚洲新兴经济体之间发生的，占此时期全球新增RTAs的近1/3；这些协定中的另外近20%（共8个）的签约一方是亚洲新兴经济体。<sup>[1]</sup>仅以中国为例，除了已经建成和谈判中的自由贸易协定外，中国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通过区域合作论坛等形式都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区域合作机制，如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中非论坛、中国阿拉伯合作论坛、中亚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论坛、东北亚合作论坛等。

在合作形式上，新南南合作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样性。既有中央政府主导的国家间双多边贸易协定和贸易互惠安排，也有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的经济合作机制与安排，还有政府与企业合作主办的对外投资项目，更有主要由企业包括大量民营企业参与的对外投资与合作项目，呈现出政府引导、企业唱戏、市场主导、官民共举的活跃局面。在经济活动形式方面，既有传统的常规贸易、经济援助、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开发，更有日益成为主体的直接投资、资源开发、加工贸易、产业合作、金融合作、技术合作。既有发展中国家之间利用差异发挥各自优势的优势互补性合作，也有通过机制化的安排形成某种合作集团并在国际经济领域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合作，如金砖国家集团、20国集团中的新兴经济体11国集团、国际气候谈判中基础四国集团等等。此外，如南部非洲合

[1] WTO,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2013. [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ta\\_participation\\_map\\_e.htm](http://www.wto.org/english/tratop_e/region_e/rta_participation_map_e.htm).

作银行的建立，中非基金等合作金融机构的建立，以及拟议中的金砖国家合作银行更是开创了南南合作的全新形式。

最后，从合作的意义与影响上看，新南南合作大大超越了过去的南南合作，具有全球性意义。传统南南合作主要是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下通过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新南南合作当然包含上述方面，更具有全新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过新南南合作将获得以往不曾有的发展空间。如前所述，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其内部已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这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创造了基本条件。同时，也还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处于前工业化阶段，迫切需要发展。新南南合作的过程，也即这些国家的发展和起飞过程。就是说，基于当今发展中国家巨大的经济规模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经济发展条件和比较优势的多样性、互补性，以往只有在南北经济关系中才能获得的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经验、产业链整合等发展要素，如今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就可以获得，传统的亚非拉殖民地国家完全可以在不依赖或较少依赖西方强国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发展，实现初步工业化。而这些国家的发展和工业化又可为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获得重要生产要素和市场创造条件。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功经验、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形态与历史经历上的相似性则为这种工业化发展创造了更宽松、和谐的政治与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紧密经济合作和经济循环的形成，将大大改变国际多边合作举步维艰的局面，打破 TPP、TTIP 等发达国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制一家独大的局面，大大增强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使国际经济关系呈现出多元平衡发展状态，从而加速国际经济秩序的改革与新秩序的建立。

### 新南南合作的模式、内容与方向

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形势复杂、困难重重。发达经济体陷入危机，复苏迟缓；新兴经济体一方面受发达国家经济危机冲击，另一方面自身面临结构转型压力，也放缓了增长势头。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以多哈回合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进展缓慢，而在新区域主义旗帜下的区域经济合作却风生水起、蓬勃发展。但自从美国主导 TPP、TTIP 后，发达国家又控制了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在这种背景下，发展新南南合作既可以对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经济复苏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平衡发展乃至世界经济的平衡发挥重要



作用。考虑到传统南南合作中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关注到TPP、TTIP等高标准、排他性区域化对新兴经济体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新南南合作的推进应有新思路、新内涵、新模式。

首先，在总体思路与模式上，探索由封闭式硬约束型一体化模式向软约束型一体化模式、软硬约束结合型一体化模式扩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是新南南合作的总体方向。199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一体化遇到挫折，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在全球经济中又呈现新势头，形成“新区域主义的兴起”。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一体化尽管发展迅速，模式却很不成熟，模仿发达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硬约束型合作模式限制了其作用。发展中国家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也有一些历史遗留的其他方面障碍，这些因素的影响使硬约束型一体化模式在南南合作过程中效果不佳。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现行经济体制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新型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应以成员国自发形成基础上的经济活动为依托，各成员国充分拥有主权平等地位，在公平协商下消除各种贸易壁垒，形成共同的经济贸易圈，达到客观融合，无需协定约束，更不用超国家机构进行管理，成员国之间以较为松散的形式进行经济合作往来，这就是软约束型一体化模式。

软约束型一体化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不搞封闭的贸易集团；另一方面，实行协调一致的单边主义，在集体行动议程的引导下，考虑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利益，调整和修改自己的单边行动计划，为实现共同目标做出各自的努力，以此推动成员国内部经济结构性改革，提升成员国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能力和水平。

APEC模式就是典型的软约束型一体化模式。虽然这种合作模式并没有完全抛开组织机构的协调，但它不需要让渡主权，更多的是功能性合作，是一种约束力较弱的合作机构。APEC的决议和共识具有非约束性，但所产生的无形压力以及激发出来的主动性是巨大的，这就是“软约束”所在。近年来由中国倡议和主导的许多双边合作论坛，如中非论坛、中阿论坛、中国与中亚合作论坛、中国东盟论坛，以及最新推出的新丝绸之路合作计划等等，都是属于这种软约束的合作形式。基于合作的灵活性、开放性，其效果正在日益显现。

其次，组建协调机构。当前，发展中国家政治立场多元化，民族、宗教等矛盾冲突，也还有许多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问题，这使新南南合作面临着诸多干扰。因此，加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协调对推动新南南合作顺利发展更为重要。如

果能够成立专门的南南合作协调机构，将有利于合作的推进。目前已有的各种发展中国家合作机制与论坛，如金砖国家间的合作，二十国集团中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合作论坛与机构，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推进这些机制的横向交流与联合。

最后，建立合理的援助与补偿机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标是使成员国从中受益，但各成员国受益程度和先后顺序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一体化更是如此。因此，需要建立一定的补偿机制，以平衡各国利益。但在一体化的初期，受益较多的国家应该做出一定的利益让步，通过援助等形式补偿利益受损的经济落后国家，顺利推进一体化进程，最终实现共同发展。目前，中国已采取了相应措施，做出了很多努力。譬如在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中国领导人宣布将向缅甸、老挝和柬埔寨三国提供特别优惠税待遇，而且还减免一些国家亏欠中国的债务。在中非合作中，中国更是提供了许多开发援助，以援助促合作。未来新南南合作中，这种援助与补偿机制仍是必不可少的。

在探索新南南合作思路与模式的基础上，还应在具体合作领域认真研究，找到最适合的领域。从现有情况看，以下领域是未来新南南合作着重发展的方向。

贸易领域。新南南合作的首要领域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展开合作，这也是较为简单易行的领域。

世界经济进入发展的不确定时期，世界贸易增长放缓，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势必受到影响。但是，如果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南南合作，我们会发现，这恰恰为南南贸易合作提供了可能。譬如，如果中国的经济增长得以维持，对原料能源的需求就会增长，其价格将坚挺，而这对以出口原料和资源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将十分有利。但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这种增长的持续必须有需求的支撑，包括外需出口。以往中国出口市场过度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如果通过金融与贸易联动，发展中国家对中国制成品的需求能够显著增长，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以新兴市场需求带动经济增长，而这又将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获得较高的原料出口收益，形成良性互动过程。即使在同一产业部门，如能适当协调贸易伙伴国的生产和投资活动，进行国际分工，也能把竞争转变为互补。

对贸易领域的新南南合作，除了传统的信贷援助、最惠国待遇之外，还应考虑尽快建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建立贸易与直接投资互动机制，通过在一些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设立出口加工区等形式，促进其出口能力的提升。应当认识到，这些国家出口能力提升的过程，

也就是其他新兴经济体市场扩大和产业转移的过程。同时，还应建立资助南南贸易的特别信贷和支付体系，签订中长期贸易协定，以便于各国制订工业计划。

金融领域。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将继续面临国外筹资方面的困难。特别是对于一些较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吸引国外资本发展本国经济已经成为经济战略中的关键环节。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资本充裕度方面存在明显的比较优势。实际上，从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可知，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巴西等发展中大国，都是对外投资较多的国家。其中，中国已经稳居对外直接投资的世界前5名，2012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达到84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sup>[1]</sup>因此，在南南合作的进程中，金融领域合作的主要表现应是资本相对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向资本相对贫乏的较不发达国家输出资本的过程。例如，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一直与非洲国家保持着密切合作，并独家发起了中非发展基金和非洲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贷款，目前对非贷款余额已达137亿美元；中非发展基金已累计决策投资35个项目，合作项目对非投资总额50多亿美元，另有40余个项目正在进行跟踪培育。当然，进一步输出资本的形式可以采取直接投资、银行贷款、证券投资等多元化形式。除了国家开发银行在非洲的尝试之外，已经成立的南部非洲发展银行和拟议中的金砖国家合作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合作银行等都是南南金融合作的重要尝试。此外，相关国家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也是未来的可能领域。这些金融机构的设立，将大大改变发展中国家过度依赖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的局面，从而改变国际经济关系的格局。

产业和技术领域。产业领域的合作是新南南合作的一个新领域。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差异性的日益明显，发展中国家形成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也形成了某种程度的过度发展。如中国的制造业、印度的信息产业与服务业、俄罗斯和巴西的某些资源和技术领域产业，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产业大发展的课题。这为南南合作中的产业合作创造了可能性。为此，发展中国家应充分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建立产业园、合营企业、技术转移等形式，积极开展创业合作。譬如，中国通过扩大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既可以大大促进当地的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又可以为中国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找到出路。印度等国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直接投资、跨国并购、合资合作等发展，更大

[1]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13 – Global Value Chains: Investment and Trade for Development”. <http://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aspx?publicationid=588>.

范围地利用自己的优势，促进南南合作的发展。

区域合作领域。新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区域合作。目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合作组织和安排已经很多，但区域合作的发展仍有相当大的潜力。在全球化挑战的面前，发展中国家间的新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不断出现，原有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推出新的合作领域。目前，南南合作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遍布亚非拉各洲。在亚洲，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进展较快。在中东地区，海湾六国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有所加快。在拉美，目前已形成以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中美洲共同市场、拉丁美洲一体化联盟等为核心的区域集团化结构，并在各区域集团之间表现出互动和互融的势头。在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势头也方兴未艾，目前已形成东南非共同市场、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中部非洲经济和货币共同体、大湖国家经济共同体、马格里布联盟等重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当然，在看到发展中国家区域合作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必须重视全球区域一体化的新趋势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这种趋势就是，以 TPP、TTIP 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主导的高标准、排他性区域合作形式正在成为区域经济合作的主流，并将引起全球区域合作规则的改变，倒逼发展中国家制度改革和开放市场进程。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如果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到这些合作机制中，由于其水平和制度标准高于发展中国家目前所能承受的水平，将会面临较大的经济冲击；如果不积极参与这些合作机制当中，则有可能再次被边缘化。不过，在我们看来，TPP、TTIP 等合作计划的推出，尽管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提出挑战，但它不是弱化了发展中国家新南南合作的必要性，而是更加强了其必要性。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合作，加快发展，才能在与发达国家的合作中获得必要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同时，只有通过发展中国家之间相对低水平的合作，才能逐步适应制度调整和市场开放的冲击，最终加快制度变革，从低水平合作走向高水平合作。■